

《水浒》的金银描写

汪远平

金银是美丽动人的。

她有具体可感的光芒形象，有美学属性，她还能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相应的化身。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之，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

金银自从来到世间，既给社会生活增添了色彩，又同时开始了以夺取金银为目的的长期不休的纷争。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文学，自然会把金银引入作品里来，也确是诞生了许多着力描绘金银的传世佳作，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施耐庵的《水浒》等等。

《水浒》反映北京社会生活，其时已开始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楮币——交子，这便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同时也铸造铜钱，宋徽宗就曾用他独创的瘦金体写“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等铸制铜钱。《水浒》中便有诸如“拿了些铜钱”、“取一串铜钱来布施他”、“官司出三千贯信赏钱”之类说法。可以讲，作为货币的纸钱、铜钱和金银，是并行流通的。但是，或许由于金银具有得天独厚的美学属性，更有助于作家飞腾艺术的想象，所以作品里根本没有提到纸币，也只是少量说到铜钱，却有一、二百处写到金银。现实生活中金银那诸多作用在书中都有生动反映，且得到了艺术的升华。那凝住作者聪明才智的金银描写，照亮了社会生活一角，反射出人物个性色彩。让我们循着作家铺着的光金银光的路，步入《水浒》艺术的金银世界去做一番寻幽探宝。

拜金主义的生动画像

《水浒》里的金银描写，象一根根灵敏的神经，通向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通向作品里男男女女的身上。几乎无一例外，所有人物身上都折射出金银之光。

首先，《水浒》绘出了一幅拜金主义者的群丑图。这群丑便是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他们表现出掠夺金银的极端卑劣贪婪性。那处在封建权势中枢地位的显贵，无一不是嗜钱成性的贪官，以帮人“使钱”出身、靠踢毬发迹的高俅，便是个“以权谋取金银”的典型，他在定夺征进人马时，竟“无银两使用者，都充头哨出阵交锋；有银两者，留在中军，虚功滥报。似此奸弊，非止一端”。因而将士便争相贿赂，弄得权柄上手，便“克制军粮，杀良冒功”，一片昏庸腐败。如此贪婪本性，连当时的辽国丞相也看得清清楚楚：“目今中国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专权，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可把金帛贿赂，与此四人，买其

请和，必降诏赦，收兵罢战。”高俅等接受贿赂后，便不惜出卖宋朝，暗通辽国。正是“上行下效”，各地贪官则是“文官要钱，武将怕死”、“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那大名府留守梁中书搜刮民脂民膏，连续二年“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生辰”；张都监接受别人贿赂，栽赃陷害武松，又以“金帛”去贿赂知府，欲置武松于死地；就连那小小的阳谷县知县，在短短任期内，便“赚得好些金银”，且要送上东京去“谋个升转”。就是那个大骂高俅“谗佞”，被梁山好汉赞为“好心人”的宿太尉，也是一个拜金主义的贪官，他先后四次接受宋江等人的贿赂，收了“一盘金银”、“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等礼品。还有那个武松为之大打出手的施恩父子，本也是唯金银是图的货色，为了每月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甚至不惜利用“八九十个拚命囚徒”去开赌坊。如此等等，正所谓“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这群大大小小的拜金主义者还构织了严密的掠夺网，上有皇帝和以高俅为首的“四贼”，组成了最高的统治集团，下有各地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以及见钱眼开的差拨吏役之类。在官场里还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裙带关系：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江州知府蔡德章是蔡京儿子，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太尉叔伯兄弟，等等。这就是说，大小统治者及其爪牙，上下串联一气，形成了一个掠夺金银财富的罗网。这也是《水浒》所描绘的拜金主义群丑图的一个重要特点。

《水浒》还多色调、多侧面地展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现实。《共产党宣言》在揭露资本主义丑恶时，说到：“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水浒》所反映的封建社会生活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散发着浓烈铜臭味的丑剧。什么亲属关系，什么王法律令，什么伦理道德，在闪光的金银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那缉捕使臣何涛，平日对兄弟何清毫无情义，到了需要兄弟为生辰纲案提供线索时，才临时去叙“兄弟情”。可是，何清在大兄困窘时摆了架子，且予以挖苦讥讽。最后，当何涛“慌忙取一个十两银子，放在桌上”时，那何清才论价出卖情报。请看，几十年的“兄弟情”在闪闪发光的一锭银子面前，显得何等暗淡失色。我们还触目可见，金银可以买来人情，可以打通关系，可以抹掉王法。柴进摆出十两银子，立即使公差为“犯人”开枷；宋江“取二十两花银”送与都头，即可避免一场劫难。金钱，既能使人谋财害命，又能使人自取绝路。恶差董超、薛霸见到陆谦取出十两贿银，即刻答应谋害林冲性命。在李固“两个大银”和“五十两蒜条金”贿赂下，他们又一次举起罪恶的棍棒，欲害卢俊义。“恶有恶报”，他们终于葬身在燕青的箭下。就这样，董超、薛霸以贪婪金银为罪恶生涯的发端，又以积聚金银为生命的终止。金银，使他们走上邪路，又腐蚀了他们的灵魂，吞噬了他们的肉体。这既是对拜金主义深刻的揭露，又是辛辣的嘲讽。

在这种“金钱通神”的封建社会里，还应运滋生诸多病态而丑陋的怪现象。所谓“打通关节”即是一种，套用现代语汇，也即是“走后门”的意思。这种风气，弥漫着整个社会，就象一种瘟病在蔓延传布着，这反映了拜金主义的毒害性和污染性。比方说，身为小吏的宋江，“犯法”并不感到可怕，因为他说“县里府上都有相识”。相识者，走后门之引路者也。连那辽国丞相为贿赂高俅等人，也懂得派众人“先寻门路”。梁山一伙，最终被招安，自有复杂原因，但与宋江的善于钻营，精于疏通人事关系，也是息息相关的。如走皇帝宠妓李师师的“后门”，按作品说法是“就行钻刺关节”、“枕头上关节最快”。为此，宋江、燕青等人四次以金银、金珠细软之物去打动、收买李师师和虔婆的心，终于使燕青得以向李师师诉说招安衷情，并通过李师师“枕头关节”得以面见徽宗。至于打通宿太尉关节，那更是靠着一盘盘“金银”的魔力了。就是那贿银也有形形色色的名称，有所谓“都头见钱便好，无钱恶眼相看。因

此钱名好看，只钱无法无官”的“好看钱”，有见面先送礼的“常例钱”，有疏通关系，求取人情的“人事银两”等等。这说明在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都涣散出令人呕心的铜臭味，都有拜金主义者的丑恶表演。

梁山好汉的“金银观”

在弥漫着拜金主义空气的社会里，梁山好汉是否也是金银拜物教的信徒？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金银观”？

我们知道，宋代商品经济已有极大发展，单是海外贸易就十分发达，成了政府的一大财源，中国钱币也大量流出海外，日本全国有二十八处曾出土了中国铜钱，总计达十五万枚。宋代商品经济和贸易兴旺景象由此窥见一斑。与此同时，城镇获得了迅速发展，商人和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当时东京就有百多万人口，乃是世界最大城市。因此，市民的追求金钱和商人的唯利是图，自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并必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色人物的头脑里。多数梁山好汉本来就活动在城镇舞台上，即使落草于各个山头，他们也是多以过往商贾和村镇富豪为劫取金银财富的主要对象。况且，在商品流通的阶级社会里，金银既是一般商品的等价物，又是财富的化身。梁山好汉要生存，就离不开商品，也可以说离不开金银。因此，他们虽然是英雄，但也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拜金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讲：梁山好汉既不是黄金拜物教信徒，但也决不是“厌”金主义者。他们只能慷慨解囊、“挥”金如土，但决不可能厌弃金银、“视”金如土。

第一，梁山好汉的至高理想是裹着金银圈的。一百单八将落草山林的原因及逼上梁山的道路，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向往的“大秤分金银”的至高理想，却几乎是一样的。梁山第一代头领王伦就用“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话来动员杨志落草。晁盖、吴用等人是抱着“献金银”“入股”的思想走上梁山的，诚如吴用所说：“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晁盖当上第二代梁山头领后，颇为满足于“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锦”的快活生活。到了宋江时代，那金银简直成了一根变化多端、威力无穷的“魔棍”。

“智取生辰纲”虽是建树梁山大厦的一块奠基石，带有反封建统治的政治色彩，但也包含着劫取者追求金银的些微因素。十万贯金银到手后，白胜分得“一包金银”，那三阮兄弟也“已得了财”，自回石碣村快活去了。他们都没有立即把此举同今后的造反行动联系起来。那许多好汉所以落草山林的复杂原因中，同样也包含着好汉们对“论称分金银”那样快活生活的向往，如燕顺对秦明说：“权就此间落草，论称分金银，整套穿衣服，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朱贵对朱富说：“兄弟，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不如带领老小，跟我上山，一发入了伙，论称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他们打家劫舍的一个主要目标，也是劫夺金银。那晁盖刚坐上第一把交椅，即刻派人下山劫夺了过路商人的“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山寨内部的财物分配，又以金银为主要内容，且多数为头领所占。如桃花山寨头领周通把劫夺来的金银缎匹分作三分，他和另一个头领李忠就各得一分，而数百小喽罗才仅仅得到一分。凡此种说明，梁山英雄虽不是拜金主义者，但也不能完全脱“俗”，他们人生目的的一个内容也是追求金银，他们的理想蒙上一层“金”光“银”光！

第二，梁山好汉在日常生活里是不忘积聚金银的。且不说他们招安之后，多次接受朝廷的金银赏赐，单是在各项日常活动中，也是把金银记在心间的。邹渊答应与孙二娘聚义时，首先想到的是回登云山寨里“收拾金银”；孙立等人杀入毛太公庄，第一个举动就是“去卧房

里搜捡得十数包金银财宝”；梁山大军攻入青州城，便把“府库金帛”装了车运走；卢俊义破了大名府，先奔到家中，“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财宝”装车运往梁山；张顺报仇雪恨，把张旺捆绑起来扔到江里后，不忘“就船内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银两，都收拾包裹里”；燕青决定退居山野，似有充当世外桃源人意味，却依然意识到金银对人之生活的好处与价值，在起程之际“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即使那些最富有传奇色彩、叱咤风云的英雄，对金银也是“有感情的”。鲁智深从桃花山“滚将”下去之前，“粗中有细”地“拿了桌上金银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他当然懂得金银可以换来大碗酒喝，换来快活。武松在去投案自首之际，记得嘱托邻舍把家中物件换些银两，“作随衙用度之资”。做了张都监的所谓“亲随体己人”后，他即想到买个柳藤箱子，把“外人俱送些金银”，都锁在箱子里。在鸳鸯楼复仇之后，他“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几件在怀里。”最后，他接受了十万贯赐钱，当了和尚，以终天年。可见，英雄们既追求“论称分金银”的至高理想，又绝不轻视“零碎银子”——这是换一碗酒吃所必需的呀！

第三，金银是构成四海豪杰逼上梁山的一个因素。我们常说“官逼民反”，这是很对的。但细加分析，这“逼”字的内涵是异常丰富多样的，且总是最终落到经济原因上来的。林冲本来是比较富裕殷实的军官，由于高俅政治上的陷害，逼得他家破人亡，最后忍无可忍在山神庙前手刃了仇人。但是，报仇雪恨之后，又往那里去呢？且不说官府追捕，单就身边没有银两，生活也已经无依无靠无着落了，所以只好落草了。那些战败归降的朝廷武官们，大也都只有落草梁山才有生路，否则，单就战败被俘这一条，就会丢了官位，丢了生计，基本生活也无着落。至于出身低微的人，则多是直接出于经济原因，如燕顺、吕方、郭盛、朱贵、石秀等，都是因为做买卖消折了本钱，身旁无银两，才被迫铤而走险的。

第四，某些好汉的所谓“仗义疏财”是有条件的。“最恨奸谋欺白日，独持义气薄黄金”。比起封建统治者的拜金主义，梁山好汉当然可以说是“薄黄金”的。书中描写了宋江、柴进等人“仗义疏财”的言行，并以此作为崇高道德标准，加以尽情歌颂；不少《水浒》评论文章也是予以热烈赞扬的。其实，这是不妥当的。宋江、柴进等人虽然也有“济人贫苦，矜人之急”的一些表现，如宋江以银子接济说唱女娘等，但我们切切不可把他们的所谓“仗义疏财”看得太纯净、太高尚了。因为他们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施行“义”的，也并非随便“疏财”的，更不是没有个人目的的。他们仗义疏财的对象，多是市井细民、来往客商和四方好汉，如作品具体写到接受宋江施舍金银的十七人中，便无一农民。柴进也是这样。他们是地主，金银是从农民身上榨取来的，他们是不会再去周济农民的。他们在“撒漫”银子时，也往往抱有个人目的，如轻财好施以笼络人心，用银子结交四海好汉以沽名钓誉，还有诸如拉拢“私人感情”、培植个人势力等等。所以我们对“仗义疏财”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一味赞扬，也不宜一概否定。

金银描写折射出人物个性色彩

在金银的绘声绘色中，《水浒》作者自如驾驭各种技巧，融进自己的才智，使人物形象的独特个性色彩，在金银描写的艺术聚光灯照耀下，得以廓大、突现。

首先，借助金银描写，来构成鲜明的人物对比，使人物个性“相互映照，相得益彰”。这有时是通过人物对金银财宝的不同态度与反应的对比描写，来显示殊异个性。林冲、宋江、武松都当过“犯人”，都在牢城营中生活过，他们对所谓“人情银子”的态度却很不一样：林

冲是被差拨骂了之后才送上去的，宋江是主动送上去的，武松则硬顶不送。这不同表现反映了人物不同的思想性格：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地位显耀，生活优厚。他骤然被害沦为“罪犯”，那里晓得牢城营规矩，也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准备，因此差拨来了，不懂得及时送上人情银子。受了差拨的痛骂，心里不满，还是委曲求全地把银子送了上去。这是因为他幻想尽快了结官司，以便家人重新团聚。由此充分体现了林冲当时逆来顺受的思想个性。宋江本是官府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深知官场的黑暗、牢城营的积弊，又颇有家产，平日“挥金如土”，对面临的局势也早有周密谋划，因而差拨一到便主动把银子送了上去，且能应对自如，游刃有余。宋江的权谋圆滑由此窥见一斑。武松呢？是敢于反抗压迫的硬汉，历来“吃软不吃硬”，那囚徒的忠告以及对牢狱可怕刑罚的描述，反而激起了武松的对抗情绪，他想好了“文来文对，武来武对”，因而当差拨来了时，他不但不送银两，且称“老爷”，威胁差拨：“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就这样，仅就“人情银两”的细节对比，便强烈渲染出了三个人的不同思想个性及生活经历。再如，第三回鲁达、李忠、史进拿银两资助金老父女的举止对比描写，亦十分精萃。史进“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李忠只“摸”出二两银子，鲁达嫌他“不爽利”，生气地又“丢”还李忠。就这拿银子的“取”、“摸”、“丢”的动作对比，不仅突出了史进的慷慨解囊、鲁达的豪爽坦率、李忠的自私吝啬，而且也隐含了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感情。

有的借助金银写“自衬”，即描写由于金银所引起的同一人物的前后行动对比。如沧州牢城营里的那个差拨，不见林冲把银两拿出来，就变了面皮，大骂林冲是“贼配军”，诅咒林冲“满脸都是饿文，一世也不发迹”，是“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但当林冲送去五两银子后，却立即堆上笑容，换了另副腔调恭维地说：“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时受苦，久后必然发迹。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在这里，作者只是直叙差拨的两段话，不作其他描绘，但我们透过这话语，仿佛看到了差拨那变色龙似的市侩相，其语意之势利足以使人惊心破胆，其情态之卑劣令人恶心呕吐，由此也使人感到人间之冷暖，世态之炎凉，这便是巧借金银写“自衬”的独特魅力。

通过金银描写来构成人物不同行动目的的对比，亦是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艺术手段。让我们先来看看金圣叹对“王婆贪贿说风情”的一段评点：“通篇写西门爱奸，却又处处插入虔婆爱钞，描画小人共为一事，而各为其私，真乃可丑可笑。”“共为一事”者，合力勾搭潘金莲以成奸情；“各为其私”者，便是不同行动目的的对比，即一个爱奸，一个为钞。而在引文叙事中，又以王婆爱钞为事态变化的“动因”，所以那“银子”描写贯串始末，产生了诸如王婆“一两银子便看你，五两银子便猜你，十两银子便与你说出五件事、十分光来”的许多生动描绘。即使在看似闲言碎语的人物对话中，也能有力突出人物的不同目的用心。例如，西门庆贪色，也看透王婆贪财，为求取王婆撮合，便以金银去引诱王婆，一会拿出一两银子，说：“王干娘，我少你多少茶钱？”“我问你梅汤，你却说做媒？”一会说：“我有一件心上的事，干娘若猜的着时，输与你五两银子”，那言语中烧着色情欲火；王婆贪银两，甘愿引绳牵线，借以进行勒索，因而说话围绕“银两”转，字字落到“银两”上：“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难，十分光时，使钱到九分九厘，也有难成就处。我知你从来吝啬，不肯胡乱便使钱。只这一件打搅。”这言语中则发散着铜臭味。不难看出，如此借助金银描写来构置人物行动目的的对比，不仅渲染出了“爱钞者”的丑恶灵魂，而且活现了“贪色者”的淫秽嘴脸，正有“色色入画”之妙趣。

其次，采用反复重叠手法，连续描绘人物对金银的声色姿态和种种表现，让金银折射出人物的独特个性色彩。如李逵的出场描写，就巧用了层层递进的金银描写，来强烈突现李逵性格。李逵出场伊始，便对刚刚结识的宋江撒谎，说什么他要借些碎银子去贖一锭大银子。这是借“骗银子”写李逵的“使乖”，并由此产生李逵新的行动动机：“且将去赌一赌，倘或赢得几贯钱来，请他一请也好看”。于是由“十两银子”引入了对人物性格的进一步揭示，即写李逵的“赖赌”和抢银子。李逵虽“好赌”，却只是个粗笨的赌徒，两次“博个叉”，便把十两银子输了个精光。怎么办？李逵借钱不成，公然宣称：“老爷闲常赌直，今日权且不直一遍”，竟大打出手夺了人家的银子就走。这是借“抢银子”等来表现李逵粗直中的“不直”和鲁蛮。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运用银子塑造性格时，成功地采用了引人入胜的“反衬”法，即描写了看似同人物性格相背离的行动，来映照人物的正面性格，因而大大增强了美学的愉悦感。这正如金圣叹所说：“写李逵粗直不难，莫难于写粗直人处处使乖说谎也。”（《水浒传会评本》六九三页）李逵这一系列“不直”表现，不是流氓无赖的恶作剧，而是因为要“相请宋哥哥”，又没银两一时“喉急了，时下做出了这些不直来。”于是，这不直，益发显得“直”得可爱。这就是用相反的表象去反衬正面的性格本质特征。但是，如果引文到此止笔，那银子唤起的“层层波澜”并未完全尽趣，李逵性格特征的揭示，亦尚欠火候。所以，作者又把笔墨放到银子上，描写李逵在抢了银子往回走时，被戴宗喝住了：他“惶恐满面”，承认自己“输”了银子，承认自己“不直”行为，当宋江让李逵把抢来的银子还给小张乙时，这条大汉竟象做错了事的孩子，把银子“从布衫兜里取出来，都递在宋江手里”，这一笔，把李逵对宋江的尊崇感情渲染得很实在，很可爱，且折射出李逵终究是率直憨厚的个性色彩。

如果说，作者在运用金银描写来表现李逵性格时，“金银”只是作为“媒介”，而没有化作人物的灵魂；那么，作者运用连续重复的金银描写来突出宋江思想个性时，金银就不只是“媒介”，而且已经融化在人物的灵魂血液里，成为人物思想风貌的一个特征，待人处事的一项手段，社会斗争的一种武器，因而金银描写，不仅与性格刻画“贴”得更紧，而且更富魅力、更有深度。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有关金银描写的章节，成了蕴籍深厚、文彩斐然的“金银篇”。且看第三十七回运用金银描写活现宋江个性特征所展现出来的生动情景：此回主要写宋江在揭阳镇的一段奇遇，集中刻画宋江富于权术和圆滑机变的个性特征。整个回目叙述娓娓动听，描写趣味津津，人物性格活灵活现，这便是以银钱来臻其艺术佳效的。比如说，此回着力写宋江的“以银子结人”。作者在此回目中，就有九次写到宋江的“使银撒漫”，有数可查的，就花了四十多两银子，分别赠送或贿赂薛永、梢公、公人、差拨、管营等人。其实，何止“结人”，几乎在一切场合中，宋江都是精于指挥、出动“银子兵”的。借宿不忘预先声明“依例拜纳房金”，在官场衙门的“使银”伎俩，宋江显得更为运用自如，纯熟圆转。刚到江州，即“取三两来银子，与了江州府公人”，于是使得公人“先去对管营差拨处，替宋江说了方便。”宋江更深晓“官府里菩萨都得拜”的道理，在差拨到来时，马上主动送上“十两银子”，“管营处又自加倍送十两并人事”，就是其他“下人”，也“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因此，换来“无一个不欢喜宋江”的佳效，且得免于受刑的皮肉之苦。由此可见，宋江吏道的精熟和机变的权术。即使在最危急时刻，宋江也决不会淡忘银子的价值与威力，这是因为“金银”已化作他思想灵魂的一部分，在待人、结交、处事、求吉、化凶、避险中，他都会下意识地联想起金银。例如，他要梢公摆渡，说的是“俺与你几两银子”，这虽是在急时相求中卖弄银子，但话语得体有分寸，只许以“几两银子”罢了。当穆家追兵赶来，并呼喊“快摇船拢来”时，情势比前更急了，“救人”的价格似乎应抬高些了，于是满脑子金银观念的宋江，脱口对梢公说

道：“却是不要拢船，我们自多谢你些银子”。很显然，许以梢公的银两比前多了。到了梢公要杀人害命的危险时刻，宋江惶恐之中依然不忘“期求”金银“救命”——也即是以尽数交出金银为条件，哀求梢公饶命。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借助金银的描写来渲染宋江的个性，而且把“金银”融化在人物的思想中，使之成为人物思想性格的一个特征，进而描绘由此特征滋生出来的活脱鲜亮的人物言行和生活场景。

金银为人们所爱，金银是人们追逐的一个目标。所以，金银描写常常用来作为引起矛盾冲突的一个动因和激化剂，并进而在斗争中显露人物的思想风貌。俗话说：一文钱也能憋死个英雄。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往往就为几两银子，骤然掀起洪波大浪，直至大打出手，人物个性的刻画也就寓在其中了。杨志失陷生辰纲，破灭了升官发财的迷梦，就在闷闷不乐走下黄泥冈后，又饥又渴，身上无分银，于是被迫陷入了吃酒赖帐的窘境，这对高傲骄横的杨志来说，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但杨志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固有本性：当店主赶去要钱时，“被杨志一拳打翻了”，当庄客又来赶时，杨志竟顿起杀机，以为“结果了这厮一个，那厮们都不敢追来。”可见，杨志虽处逆境，但那心狠毒辣的性格，依然如故。再如，雷横到勾栏里听唱，忘了带赏钱，虽然他向女艺人白秀英解释：“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却恨今日忘记带来”，但对方反唇相讥：“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白玉乔甚至痛骂雷横是“驴筋头”，结果，为几两赏银，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导致了“雷横枷打白秀英”，由此充分反映出雷横的暴躁，白秀英的撒泼，白玉乔的刻薄和仗势凌人。

以银子为“关目”的情节波澜

金银描写在《水浒》情节结构中的独特作用，亦是十分显著的。金圣叹在论述此一问题时就有诸如“以银子为之张本”、“一篇之眼”、“于银子三致意焉”、“十三可叹也”等评点。可以说，《水浒》作者擅长于把握和运用金银的固有特性及其美感作用，把金银描写织入作品整体艺术构思中，使之成为丰富情节的因素，严密结构的纽带，故事发展的动力。

某些金银描写是事变的因由和情节的发端，起到了促使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的作用。第二十回写到，晁盖等梁山英雄为感激宋江当初的救命之恩，派刘唐带百两黄金前去郓城县向宋江致谢。可是宋江仅仅取了百两黄金中的一条金子，由此产生一场风波。原来就在收到刘唐金银书信的当天，宋江被阎婆死拉硬扯到了住处，由于受到婆惜的冷淡，宋江受了一肚子气，以致次日清晨走得急，忘了带走招文袋。结果，婆惜从招文袋里的刘唐书信中，发现了宋江“私通”梁山的秘密，于是威胁要挟宋江。本来宋江是想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可是也巧得很，宋江不受梁山赠送的百两黄金，而婆惜偏偏要宋江当场交出那百两金子。宋江越加解释，婆惜越是不信。最后，宋江一怒之下动了刀子才算解决矛盾，——但事态也因而扩大了。可见，这“百两黄金”成了“怒杀婆惜”事变的起因和情节的发端。再如，“船火儿大闹浔阳江”一节中那“节节生奇，层层追险”的一连串戏剧性情节，便起因于宋江“不合将五两银子贲发了那个教师”（薛永），因为此举触犯了穆氏兄弟，进而滋生出使人惊叹不止的事件来。

有些金银描写，灵活多变，是贯穿情节的“链条”，组织结构的“媒介”，引起突转的“关目”，它使情节此呼彼应，浑然一体，产生了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曲折性。如西门庆一伙毒死武大，为使何九叔在殓武大尸首时，“凡百事周全，一床锦被遮盖则个，别无多言”，西门庆“去袖子里摸出一锭十两银子”，加以贿赂。可是精细圆滑的何九叔，并不轻易就范，而是安排了一条应付不测的后路：偷“拿了两块骨头，和这十两银子收着，便是个老大证见”。

于是“十两银子”暂时隐伏了下来，在暗处开始充当了贯穿情节的“链条”。果然，武松出差归来，决心为屈死的哥哥伸冤。在审问何九叔时，武松那烈火狂飙般的气势，逼使对方交出袋儿，出示了那“一锭十两银子”，且交待了事情经过。武松当即“藏了骨头、银子”。于是情节又推进一步，武松带着那“两块酥黑骨头、十两银子”等，前去告状。但受了贿赂的知县驳回原告。武松无奈“收了银子和骨殖，再付与何九叔收了”，决心以己之力进行复仇。可以看出，那“十两银子”从西门庆拿了出来，到武松再付与何九叔，几经反复转手，每次转手都使前后情节勾联与贯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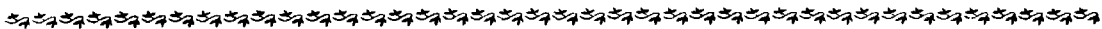
金银描写，还能巧妙地充当情节突转的“关目”。例如晁盖等七人劫取“生辰纲”不久，官兵们就在白胜家里，“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银”，于是白胜被捕，生辰纲事发，晁盖等七人成为了在逃“罪犯”，情节发生了逆转。又如，张都监以“银酒器皿”栽赃陷害武松，当武松见到那“约有一二百两赃物”时，“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于是，他便从张都监那虚假的“座上客”，沦为“阶下囚”。这种以金银描写为“关目”的情节“突转”，往往使故事带有动人的曲折性。如有白胜“一包金银”的被发现，才有晁盖等的被缉捕，并进而引出“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故事来。有武松的被栽赃陷害，才有武松的觉醒和“铤而走险”的决心，并进而激发起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曲折情节。

由于金银的巨大价值和世人对金银的顶礼膜拜，于是常常由金银滋生出预想不到的人间悲喜剧，这给作品情节带来令人赏心悦目的特殊情趣韵味。第六十二回写到，李固为加害卢俊义，拿出“五十两蒜条金”，贿赂两院押狱蔡福，要他“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结果卢的性命。但蔡福嫌少，经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蔡福收下了金子五百两。可是，当蔡福心满意足刚刚走进了家门时，便撞着一个不速之客——柴进，使他吃了一惊。这个柴进同李固一样，都是“引贿者”，但引贿目的却好比针尖对麦芒，恰似水火不相容：李固借蔡福之手，要卢俊义死；柴进借蔡福之手，要卢俊义活。这“死”与“活”的请求本来是无法兼而照顾起来的，然而熟知官场荫私，精于仕途经济的蔡福，把双方的贿赂黄金都收了下來，在权衡一番利害之后，把“死”与“活”的天平重心移到了“活”的一边，想法周全卢俊义性命；对李固则婉言推托，虚与周旋。如此驾驭巧合的情节，处理对峙的局面，不仅使处在矛盾夹缝里的蔡福形象，显得鲜明生动，而且使读者在情节的巧合、对立、联系和统一中，领略到一种美的愉悦和情趣。

那脍炙人口的第九回，更是以金银为关目，娓娓铺叙的悲喜剧。金圣叹在此回评点中说：“此一回中又于正文之外，旁作余文，则于银子三致意焉。”在这里，金氏指出此回中的余文多以银子致意生趣，并具体分析作者写银子的“十三可叹”之处。比方说，这个回目共展开描写了三个生活场景，每个场景都以银子“致意”，都富有戏剧性，都荡漾出趣味横生的韵味。第一场景，写林冲在野猪林，“泪如雨下”、束手待毙之际，突然响起雷鸣也似吼声，杀出了鲁智深，把林冲从死神手中救了出来，使读者情绪从大悲转为大喜。而那耀武扬威的薛霸、董超，则成了可笑的惊弓之鸟。就在这特定环境里，作者腾出手来，写了这两个公差那“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着陆谦自去寻这和尚便了”的一段心理活动，突现他们的卑劣，使人发出揶揄的嘲笑声，又写了鲁智深的慷慨解囊，使读者对鲁智深顿生崇敬之情。第二场景，写“林冲棒打洪教头”，其戏剧性为人们熟知，自不必赘叙。但作者细致描写那“二十五两一锭大银”所隐蓄的艺术匠心，似还没引起人们重视，倒是值得一说：柴进这“权为利物”的银子，是在什么情况下拿出来呢？开始，林冲是带枷与洪教头交手的，在“使了四五合棒”时，林冲突然跳出圈外，说：“小人只多这具枷，因此，权当输了。”此刻，柴进才感到“一时

失了计较”，以十两银子换得公差为林冲开枷，并让两位教师“再试一棒”。就在此刻，柴进才取出“一锭银来，重二十五两”，作为比试胜者的利物。这是为了助兴，也是为了奖赏林冲，因为柴进已经粗粗领略了林冲的本事。在林冲不愿尽力而为又带着枷的情况下，洪教头尚且无法取胜，若是林冲开了枷，洪教头又如何对付？那么，怎样使林冲使出真本事呢？柴进以宏宏大度的言语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去解除林冲的思想顾虑；又采取了“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的举动，去刺激洪教头。因为这对于虚张声势又急于争得银子的洪教头来说，犹如干柴火上浇了油，那好胜之心就更为火烧火燎了，也就容易因急功夺利而分散注意力，乱了阵脚。柴进此番用心和“暗示”，林冲是神会心领的，如他所想：“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既然如此，林冲当然愿意使出真本事了，而这正是爱惜天下豪杰的柴进所期待的。所以，在林冲把洪教头打得“扑地倒了”时，“柴进大喜”，并“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送与林冲”，一个“捧”字写尽了柴进敬慕英雄的情怀。此中艺术匠心，金氏作了精辟论述：“洪教头之败也，大官人实以二十五两乱之，七可叹也；银之所在，名誉身份都不复惜也。柴林之握别也，又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八可叹也；虽圣贤豪杰，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将其爱敬，设若无之，便若冷淡之甚也。”（《水浒传会评本》，188页）第三个生活场景，是写林冲在牢城营的“奇遇”，突出刻绘了差拨见钱眼开的丑恶嘴脸。这三个生活场景，全都借助“金银”描写，去形成“涟漪不绝”的情节波澜，唤起读者意味横生的美学情趣，无疑这是金银描写给作品所带来的戏剧性效果。

《水浒》的艺术实践启迪我们，那具有鲜艳色泽和诸多职能的金银，一旦被名师巨匠引入作品里，就会放射耀眼的光芒，产生动人的魅力。但是，要使金银描写笔下生花，摄魂揪魄，不经历一番艰苦实践，不具备孜孜以求的匠心独运，那是断然难以奏其功效、成其华章的。让我们如同欣赏和喜爱现实生活里的金银那样，抱着浓厚的兴趣，去探究金银的表现课题，去领略金银描写范例的经验，以求得艺术的启迪与教益。



（上接115页）

注释：

① 朱颖晖《孟称舜〈娇红记〉的悲剧风格》，载《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沈尧《明末古典剧论新篇章》，载《戏曲研究》第九辑。

②⑧ 宋之绳《二胥记叙》。

③ 见《明史·佞倖传》。

④ 《盛明杂剧》。

⑤ 《古今名剧合选·爵江集》。

⑥⑦ 《盛明杂集》二集。

⑨ 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

⑩ 《二胥记》，巽倩龙友氏批语。

⑪⑰⑳ 孟称舜《二胥记题词》。

⑫⑱ 马权奇《二胥记题词》。

⑬ 雨果《莎士比亚的天才》。

⑭ 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

⑮⑳ 陈洪绶《娇红记序》。

⑯⑳㉑㉒ 孟称舜《贞文记题词》。

⑰ 王廷相《太极辩》。

⑱ 王廷相《雅述》。

⑳㉑ 马权奇《鸳鸯冢题词》。

㉒ 孟称舜《娇红记题词》。

㉓ 《花前一笑》，陈洪绶批语。

㉔ 朱颖晖《孟称舜〈娇红记〉的悲剧风格》。

㉕㉖ 王业浩《鸳鸯冢序》。

㉗ 《娇红记》，陈洪绶批语。

㉘ 《贞文记》，陈箴言等批语。